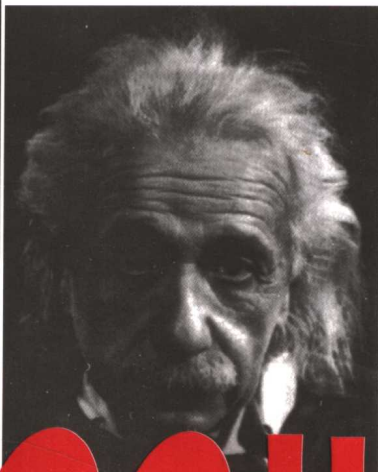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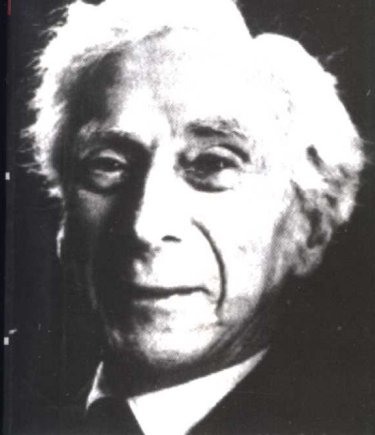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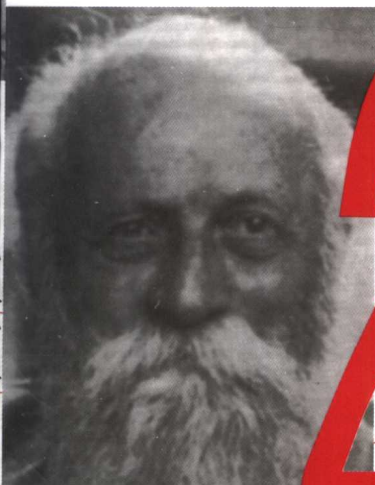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美] 大卫·斯笛尔 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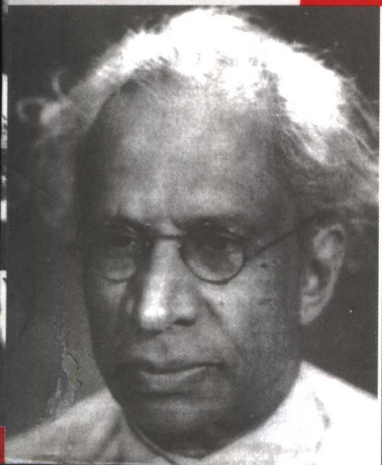
田毅松 赵正国 等 译

卢华萍 校



20世纪 七大思想家 自述

上海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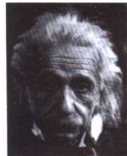


[美] 大卫·斯笛尔 编

田毅松 赵正国 等 译

卢华萍 校

20世纪 七 大思想家 自述



上海人民出版社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 世纪七大思想家自述/(美)斯笛尔(Steele, D.)编;田毅松等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书名原文:Genius

ISBN 7-208-05049-X

I. 2... II. ①斯...②田... III. 思想史—世界—20 世纪 IV. B1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12901 号

责任编辑 孙 瑜

封面装帧 傅惟本

20 世纪七大思想家自述

[美]大卫·斯笛尔 编

田毅松 赵正国等 译

卢华萍 校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3.75 插页 5 字数 329,000

2004 年 4 月第 1 版 200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100

ISBN 7-208-05049-X/B·417

定价 26.00 元

前言

哲学的自传

阿瑟·叔本华在他的名著《作为意志和观念的世界》中几乎一笔带过地谈到了天才的问题。“他们孤独地、零星地出现在世纪的长河中，”他写道，影射的是来自诗人维吉尔的一个形象——一个人若不记住叔本华的如下隐喻就永远都无法遇见这个人：“他们孤独地出现，在污浊的巨流中游过。”

在维吉尔的诗中，这段话出现在一个著名的篇章中——海上的一场灾难，复仇女神想阻碍出发去意大利建立新家园的特洛伊人的远征。这是一个充满了恐怖和毁灭的场景：桅杆折了，绳索断了，人们被抛到船外，淹没在汹涌的大海中。

但叔本华更换了视角——几乎像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看这个场景，把它变成了孤独的人物在巨大的无知世界中摸索行路的一种诗意的表达。很难不相信，他心里想的是作为一个思想家的他自己，孤独地、奋力地挣扎着——隔着岁月陪伴着柏拉图和康德这样一些在世纪的漫漫长途上同样“孤独地、零星地”出现的哲学心灵。例如，在叔本华的世纪中，总共也许有五六个这样的独游者，事实上多数是德国人：费希特、谢林、黑格尔和尼采。当然，在上一个世纪还有康德，以及贝克莱和休谟，而其余的所有人都相形见绌了。

但没有一个世纪出现过许多这样的心灵,而在大多数世纪中甚至一个也没有。

哲学家的生活自然一直是让人好奇的一个话题,自古就是如此。我们所拥有的哲学生活的典范来自柏拉图对苏格拉底的刻画。柏拉图甚至在《申辩篇》中让苏格拉底有了一个口述的自传。但即使与稀缺的哲学家相比,哲学自传仍然是非常罕见的;其中最好的例子也许是把自传当作一种哲学写作形式,比如圣奥古斯丁的《忏悔录》,或者笛卡尔的《沉思》。

自认为是文人的休漠写了一篇充满启发意义却极简短的自传;视自己为预言者的尼采写了充满慨叹的《看哪,这人》,但读者很难不把它看作他发疯的前兆。固然,哲学的写作经常隐含着一种不自觉的自我肖像,因为我们觉得能够从文中辨别出这个哲学家是一个怎样的人;而且,不管文字多么地客观冷静,作者的人格常常在事例和不经意的见解中显露出来。但是,这远不足以让我们知道生活是怎样的,而正是这种生活造就了我们今天仍在深思的那些文字。

一种生活无论如何都不同于一种事业,因而一个自传也就区别于一份简历。即使当大多数哲学家们随着 20 世纪哲学的专业化而成为学院里的学者时,情况也是如此。即使,在这个时代,当哲学家们的写作必须适应专业期刊和学术机构的规范时,哲学创造者们仍然“孤独地、零星地”出现着,他们的生活因为他们思想的大胆和深邃而让人着迷。虽然如此多的哲学写作都采取了注解、批评、回应和评论的形式,哲学中却仍然保留了对大视野的期待;它隐含在一些大题目中,诸如《神秘主义与逻辑》(罗素),《存在与虚无》(萨特),《真理与方法》(伽达默尔),《我与你》(布伯)或者《真理,语言和逻辑》(艾耶尔)。这些哲学家的自传就出现在这里。

把我们引向哲学的,部分是对最广阔的可能视野的渴望,而这

些无畏的探索者用自己的话告诉了人们他们是如何突破自己的视野的。这是关于发现、关于智慧之勇气的珍贵的文字。

阿瑟·C. 丹图 (Arthur C. Danto)

哥伦比亚大学约翰逊名誉退休哲学教授

导 言

在人类思想史上,过去的一百年见证了一场巨大而骇人的变动,在这场变动中,庞大的意识形态体系像星系一般相互撞击,落入了混乱无序的状态。一度确定无疑的东西开始受到质疑,曾经拥有的希望遭遇了挫折,古老的信念被碾成了粉末。

相聚在这里的七个人的声音为我们提供了一幅色彩斑斓的图景,它捕捉了近几十年来知识界的激荡。

- 伯特兰·罗素(1872—1970)是一位激进的英国贵族,他结合了具有摧毁力量的怀疑主义和提升道德理想的巨大热情。

-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1879—1955)颠覆了经典物理学,为量子力学铺平了道路,尽管他本人无法接受后者更为激进的含义。

- 马丁·布伯(1878—1965)以最基本的人类关系为材料,建立起了一座新的存在主义的人道主义大厦。

- 萨瓦帕利·拉达克里希南(1888—1975),在解释如何把传统印度思想运用于现代西方问题方面,他是一个关键人物。

- 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1900—2002)是“解释学革命”的倡导者,他把文本阐释的方法延伸到了人类思想和实践的一切领域。

- 让-保罗·萨特(1905—1980)的小说、戏剧和哲学著作无情

地剖析了人类“被判自由”的处境。

● A. J. 艾耶尔 (1910—1989) 在放下逻辑实证主义数年之后却又成了逻辑实证主义的超级明星。

伯特兰·罗素长寿的一生富有成就。他在 98 岁去世之前名声日隆。由于他的反战活动和他对性道德的见解——这些见解一度令人们感到震惊,虽然现在看来还是温和的——罗素颇受争议。和许多在有生之年成名的重要思想家一样,为罗素赢得名声的事情跟他真正卓越的成就并没有多大关系。

罗素的《数学原理》(*Principles of Mathematics*, 1903) 以及后来与阿尔夫雷德·诺尔斯·怀特海 (Alfred North Whitehead) 合写的三卷本《数学原理》(*Principia Mathematica*, 1910—1913) 是他最重要的著作。这些书为之后五十年数学哲学的发展确立了方向。它们发展了逻辑主义的立场:数学命题可以被还原为逻辑,因此不为我们提供任何关于世界的描述性信息。

在研究类的数学时,罗素发现了后来以“罗素悖论”著称的一个思想难题。解决这个难题的努力同时也探到了哲学智慧的限度。这个悖论关系到不是自身的一个部分的一切类的类:如果这个类是自身的一个部分,那就意味着它不是自身的一个部分;如果它不是自身的一个部分,那又意味着它是自身的一个部分。正如罗素指出的,这类似于那个理发师悖论:如果那个乡村理发师为村里所有不为自己刮胡子的男人刮胡子,那么他为自己刮胡子吗?不管我们怎么回答,我们都会遇到矛盾。罗素本人对这个悖论的解决是他的类型理论;这个理论收在《数学原理》中,不过尚未被普遍接受为一种充分的解答。

1905 年罗素创造了他的摹状词理论。这是一个突破性的发现,它显示了一整捆哲学困惑之草如何能够被一把精确语言的镰

刀割除。许多古老的哲学探讨一再面对的一个问题是,并不存在的对象必须获得某种“存在”,因而否认“金山”、“圆的方”或者“宇宙的创造者”具有任何实在性就变得可疑了。摹状词理论通过某种改造解决了这个问题:关于“圆的方”的陈述可以转译成“ x , x 是圆的,且 x 是方的”这类陈述;改造后的陈述并不设定有什么实际事物同时符合两个摹状词。

罗素的《我们对外部世界的知识》(*Our Knowledge of the External World*, Open Court, 1914)开始了他对认识论(哲学的一个分支,关系到我们如何能够认识事物)的独特见解。罗素尝试着借助现代逻辑来重新表达经验论(这种观点认为我们的感觉提供的论据是最基础的)。对罗素的新哲学的经典阐释体现于《逻辑原子论》(*The Theory of Logical Atomism*, 1918),这本书最初出现在保罗·卡鲁斯编辑的《一元论者》(Paul Carus, *The Monist*)中。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尽管罗素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哲学思想,他仍然投入了激烈的反战运动;人们一般把这种运动称为“和平主义”,不过罗素从来就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反对在任何情况下使用武力的和平主义者。他被禁止离开英国,然后被罚了款,然后被开除了剑桥的教授资格,最后又被投入了监狱(因为他辱骂了英国的战时同盟——美国)。他在监狱里写下了他的经典之作《数理哲学导论》(*Introduction to Mathematical Philosophy*)。

由于把自己继承的全部遗产都给了有需要的朋友,罗素必须靠写作生活。20 世纪 20 年代他访问了俄罗斯和中国,分别写下了关于这两个国家的书;他写了好几册科普读物;他是遭人非议的《婚姻与道德》(*Marriage and Morals*)的作者;他还写了一本论教育的大众读物,并且通过主持一个“进步的”学校实际地贯彻了其中谈到的原则。

在 20 世纪 30 年代,和其他许多人一样,罗素预见了正在迫近

的战争。他一开始认为这场战争会像前面那一场一样遭到他的反对,但随后他又因为法西斯主义少见的威胁而转向支持战争。他在芝加哥大学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书,1940 年又受聘到纽约城市大学教哲学。纽约城市大学对他的聘请激怒了一些基督徒,他们进行了强烈而恶毒的抗议,并成功地迫使校方解除了聘约,理由是罗素在道德上不适合教书。罗素此后经常引用这个事件作为基督之爱与容忍的“卓绝例证”。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罗素把苏联视为主要的敌人,他一度甚至相信苏联会抢先发动核战争,而那时美国已经有了原子弹而苏联却还没有。但在苏联有了热核能力之后,罗素又逐步地采取了所谓的单方面裁军的立场。尽管他从不主张美国单方面裁军,但他支持英国和法国这样一些美国盟国进行单方面裁军并退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罗素始终尖锐地批判马克思主义学说,他是一个热情的民主主义者和反共主义者;不过他越来越清楚地看到,核战争是人类面对的主要威胁,而美国是核裁军的主要障碍。在古巴导弹危机和越南战争问题上他的态度是极度反美的,他在肯尼迪遇刺的问题上支持谋反论。在他的晚年,罗素在哲学上没有作出什么独创的贡献,倒是花时间写了一些娱乐性的畅销小说,如《名人的梦魇》(*Nightmares of Eminent Persons*)和《市郊的撒旦》(*Satan in the Suburbs*)。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是众所周知的 20 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他的物理实在观总是与纯粹的哲学概念和对生命的宗教感紧密联系在一起。

年轻时候的爱因斯坦被厄恩斯特·马赫极有影响力的“实证主义”观点深深吸引。马赫相信,科学理论以一种浓缩的形式概括

了观察到的和预期可被观察到的东西。它们对不能观察到的东西不置一词。

爱因斯坦后来抛弃了马赫的实证主义,认为那在哲学上是幼稚的。爱因斯坦开始坚持,是想象——甚至几乎是幻想——而不是事实的累积决定了我们对宇宙以及我们自身在其中的地位的理解,或者,爱因斯坦会说,决定了我们对那个万能者的思想的领会。

对爱因斯坦来说,“实证主义”认为事实是明显的、不言而喻的,科学则要努力调整自身以越来越接近事实。在实证的观点中,最关键的是不要过于赶超事实证据,也不要妄想那些无法被测定的东西。既然事实想必能通过观察——通过在科学仪器的辅佐下使用五种感官——被发现,那么实证主义意味着极端的经验主义:知识来源于对世界的观察,理论则仅仅是对这种知识的概括。

爱因斯坦的成熟的哲学观是对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彻底拒绝。他相信应该让人类的想象自由地发挥作用,应该大胆地建构理论。在爱因斯坦看来,只有一件事情可以把这些理论同单纯的幻想区别开来:它们同经验世界的关联。但他认为这种关联是直观的,而不是逻辑的,是把整个理论同整个经验世界联系起来,而不是通过观察来——确证理论的各个部分。

爱因斯坦敏锐地意识到了休谟和康德遗留给现代人的问题。苏格兰人大卫·休谟(1711—1776)最后表示,甚至最平常最必需的形而上学概念,比如因果概念,也无法从经验事实中符合逻辑地推导出来。进一步,甚至它们的可能性或者合理性也不能通过这种方式推导出来。这让休谟不得不得出结论说,理性是不合理的,因为它无法证明日常生活实践中不可或缺的那些概念的有效性。

伊曼纽尔·康德(1724—1804)同意,最基本的形而上学概念——时间、空间和因果性——是不可证明的,它们因此必须被接受。但康德推想,既然它们无可避免,那么它们必定是人类精神本

身的创造物。精神把这些“范畴”强加给实在,因为除此以外它没有别的途径可以去经历实在。在康德看来,一切证明或者否定这类基本的形而上学范畴的企图都是无意义的:纯粹理性在试图脱离经验中给定的东西时触到了自身的限度。

爱因斯坦用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处理了这个哲学问题。他同意休谟和康德,认为我们需要形而上学来让我们对实在的经验获得意义,但他指出,从逻辑的角度来看,一切命题都是假定,“自由选择的假定”;这不仅适用于比较“抽象”的命题,而且同样适用于那些最接近我们的感觉经验的命题。

爱因斯坦说,在一个理论体系内部,一个正确的命题可以逻辑地从那个体系推导出来。一个理论体系作为一个整体则可以根据它在多大程度上适应我们的经验总体而被接受为暂时的真理。

在早年的事业中,爱因斯坦一度促进过量子理论的建立,但他后来对尼尔斯·玻尔和“哥本哈根解释”影响下的主流量子力学的发展方向开始感到警惕。爱因斯坦的名言“上帝不跟宇宙玩骰子”表达了他对量子物理主观性的、非决定论因素的怀疑,也代表了他对宇宙背后的理智的终生信奉。

马丁·布伯的双亲是被同化了的维也纳犹太人,不过抚养他成人的祖父母严格遵奉他们的犹太传统。年轻时的布伯着迷于整个欧洲文化而放弃了所有的犹太规矩。对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尼采的兴趣促动布伯全心关注文化的和精神的复兴,由此成了犹太复国运动的积极参与者。

1901年,犹太复国运动的伟大领袖西奥多·赫茨尔(Theodor Herzl)让布伯当复国运动周刊 *Die Welt* (《世界》)的主编,但他不到一年就那个职位上退了下来。布伯与赫茨尔之间的明显分歧迅速加深。布伯赞成立即在巴勒斯坦建立农业移民地,以此作为

通向精神复兴之路,而赫茨尔关注的焦点是政治外交,意在为犹太人家园获得一个合法的基础。从 1916 年到 1924 年,布伯主编了 *Der Jude* (《犹太人》),这是犹太复国主义知识分子们的核心论坛。但是布伯采纳了一种相当不受支持的少数派立场,倡导犹太人和巴勒斯坦的多数居民进行合作,以最终建立一个阿拉伯-犹太双民族国家。

布伯从早年开始就是一个忠实的社会主义者。他表示,马克思和恩格斯过早地摈弃了所谓的“乌托邦”。布伯的著作《乌托邦之路》(*Paths in Utopia*)指出了马克思主义未能发展自己最初的目标,同时以一种最雄辩的风格主张在一个神圣基础上复兴一种乌托邦式的社会主义。

在与复国主义作家保拉·温克勒(Paula Winckler)结婚之后,布伯开始研究西哈德主义;这是民间犹太虔信主义在东欧的一种表现形式,当时有教养的知识分子都认为它落后、幼稚,因而对它很是蔑视。布伯在西哈德主义中看到有一种力量可以治愈犹太教的以及人类的病症。布伯认为,人类的三大关系——人与上帝,人与人,人与自然——只有通过在神圣的、人类的和自然的三个层次上同另一个与自己“相互关联”的人相遇才能恢复到各自的恰当位置上,就像在西哈德主义中一样。

最初,布伯被西哈德主义中的神秘色彩深深吸引——这种宗教流派注重崇拜瞬间的迷狂。部分由于基督教存在主义哲学家索伦·克尔凯郭尔(Soren Kierkegaard)的影响,布伯后来又对神秘主义感到不满意,认为它体验到的与绝对者合一的状态是虚幻的,因为分离的自我仍然存在。当布伯在 1923 年着手写他最卓越、得到最广泛阅读的著作《我与你》时,已经可以把他说成是一个犹太存在主义者而非神秘主义者了:他批评了神秘主义对合一的追求,相反强调关系这一基本概念。寻求与上帝或者宇宙的合一就是在

寻求浸没,这是自我的湮灭,因而也湮灭了存在过的实在。进一步,对神秘合一的迷醉等于把日常生活判定成了无意义的或者虚幻的,从而把宗教体验扯离了日常经验。布伯由此开始高度重视西哈德教义中非神秘主义的一面——为世俗事务注入永恒的气息,从而使它们变得神圣起来。

1934 年布伯开始领导一个组织,该组织的内容是犹太成人教育和全德国犹太教师的进修。他大胆地反对纳粹政府对犹太人及其文化活动日益嚣张的打击,直到他被驱逐出教育界并在 60 岁时移居巴勒斯坦。他成了耶路撒冷的希伯来大学的社会哲学教授;在以色列国家成立之后,他帮助创立了、随后又领导了成人教育教师进修学院,为正在涌入以色列的新移民培养教育者。

在耶路撒冷,布伯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因为他坚决反对主流复国主义政策对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态度,特别是他毫不含糊地指出了复国主义主导路线与德国纳粹的极度相似性。1939 年他推动建立了犹太-阿拉伯和睦与合作联合会,1942 年建立了被称为伊胡德(Ihud)的犹太“双民族主义”政治团体。布伯表明,犹太复国主义如果坚持通过战争来强加一种犹太教而不是一个双民族国家,如果它真的把巴勒斯坦人贬为二等公民,它就只能建起一个脆弱的、军国主义的西方飞地,而在已经扎根于中东的各民族中孤立无援。在以色列国家建立之后,布伯放弃了他的双民族倡议,但继续抗议犹太国家对巴勒斯坦人民不公正的对待。

从 20 世纪 20 年代起,布伯就已经参与了犹太教-基督教对话。他的《两种信仰》(*Two Types of Faith*)一书(写于耶路撒冷围困期,1951 年出版)让这个对话获得了一种新的转机。该书起初颇受争议,尤其在基督教神学家中,他们中的有些人谴责它,另有一些人则认为它是有帮助的,也是富有启发意义的。布伯区别了希伯来先知和耶稣的信仰(本质上是犹太人的)与保罗和约翰的

信仰(它界定了新的宗教)。《两种信仰》颂扬基督精神,同时又坦白地坚持犹太人永远不会接受耶稣的神性或他的救赎。

在他的晚年,布伯被誉为最杰出的以色列学者和哲学家,尽管他并不赞同自己国家的主流政治。他继续他的政治活动,继续写作、教书,继续翻译犹太教圣经。他去世的时候得到了犹太人也得到了许多巴勒斯坦人的哀悼,阿拉伯学者组织的一个代表团在他的墓上敬献了花圈。

萨瓦帕利·拉达克里希南因他很多深奥却流行的书而著名,诸如《印度哲学》(*Indian Philosophy*, 1923—1927),《一种唯心主义的生命观》(*An Idealist View of Life*, 1929),《宗教的东方与西方》(*East and West in Religion*, 1933)和《东方宗教与西方思想》(*Eastern Religions and Western Thought*, 1939)。拉达克里希南参照东方来解释西方,同时也参照西方来解释东方。如他所说,英国人以为他们因为征服过印度就理解印度了;但拉达克里希南表明,西方人对印度教的见解充满了误会。同时,他坚持认为印度也应该向基督教、向西方科技学习。

拉达克里希南所辩护的立场从他以后已经变成了普遍的共识:所有各派宗教都有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没有哪一个是终极的、完美的,因此世界上的所有宗教派别都能够相互学习,并且也应当携手努力来探讨和平、环境和社会正义等问题。依照拉达克里希南的理解,宗教在现代世界中表面上的衰落其实是一种假象。宗教永远都不可能消失,它只采取新的形式。在20世纪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替代性宗教,如人道主义、进化论或者辩证唯物主义等,但它们都是不充分的。

拉达克里希南完全认可物质世界的实在性以及现代物理科学的发现,而驳斥诸如泛灵论(认为所有的实在本质上都是意识的)

之类的学说。但他论证说,宗教体验,尤其是神秘的宗教体验,其内涵在不同的文化间是如此相似,以致我们必须赋予它以基本物理事实一般的客观性,尽管对那些体验的解释——像所有科学理论一样——比宗教体验瞬间所窥到的根本实在本身更具有试探性,也更值得质疑。

拉达克里希南的形而上学是一种唯心主义。他认为宇宙和物理进程最终依赖于超验的力量。机械因果论是理解宇宙某些特殊部分的一种方式,只要有效,但用不妨;但是经典物理学的衰落表明它并没有把握全部真理。如果决定论和经典物理学就是全部真理,那么物质的每一种可能的安排方式将都已出现,它们只是在时间的展开中一再重复出现而已。相反,自然中的事件是“无限的和无定型的”,始终不断地产生着全新的东西。拉达克里希南还认为,机械论分析无法理解有机整体论的实在,因为在后者中,即便在最简单的物理实体那里,“整体的计划也决定着整体内部各部分的特征”。

拉达克里希南崇拜甘地,为印度“贱民”的权利奔走呼告。他对种姓制度的态度是有节制的:尽管他认为这种制度目前的形式是不正义的,但同时也认为人们一直以来忽略了它偶然具有的某些益处。

从1946到1952年,拉达克里希南是国际教科文组织印度代表团的领导。1949年他被任命为印度驻苏联大使。1952年回到印度时,继印度独立后首位总统拉金德拉·普拉萨德(Rajendra Prasad)之后,被选为印度总统。拉达克里希南1957年退出了政坛。

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是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知识运动之一哲学解释学的最著名代表。“解释学”一词是指阐释的技艺和

理论。它曾经指神学家对圣典的阐释,后来延伸到对一切文本的阐释,最后又延伸到了对整个世界的解释。

新教神学家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 1768—1834)让人们注意到了著名的“解释学循环”——对一个文本各部分的解释依赖于对整个文本的解释,因而反过来又依赖于对每一个部分的解释。哲学家威廉·狄尔泰(Wilhelm Dilthey, 1833—1911)认为,解释学方法可以延伸到每一个需要阐释和理解的学科。在狄尔泰看来,这适用于人文科学,比如历史和社会学,但不适用于物理学和生物学这样的自然科学。

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伽达默尔在哲学解释学上的缓慢进展并没有得到多少关注。然而,随着他的《真理与方法》(*Truth and Method*)在1960年发表,他一举成名了。他早期的著述多是一些沉闷无趣的文章,主要是对柏拉图对话之类文本的详尽分析,《真理与方法》却有着令人吃惊的清晰、普适性和雄辩的力量。

在可能最让人难忘的那一段中他出人意料地摧毁了一种假定——哲学家首先要抛弃他们所有的成见。伽达默尔说,成见是“进行理解的条件”。这不是说,所有的成见都应该被保存下来。它是说,在传统和理性之间存在着的是相互性而不是对立。伽达默尔对成见的辩护导致了他和于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的一场争论,后者指责伽达默尔的思想过分囿于传统了。

伽达默尔对美国的哲学家产生过某些影响,但和当代许多欧陆哲学家一样,他对哲学之外的美国人文学科影响更大,尤其是法学、政治学和文艺理论。伽达默尔的阐释理论认为,阐释者和被阐释者进行着一种交谈,这种交谈一旦成功就会产生“视域的某种融合”。

伽达默尔认为不存在对文本的唯一正确的解释,这个观点很